

19.06

如马



11/89

92 ✓

政协龙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龙川县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编

前 言

热爱祖国教育是中学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热爱家乡是热爱祖国的起点。帮助学生了解家乡，从而增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思想感情是我们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为适应我县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需要，我们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县教育局教研室联合编成这本适用于全县中学（含师范、农职中）的乡情教育材料——《故乡情》。这本作品集，主要编选了我县作家萧殷、谢逢松、华棠等三位同志写龙川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如诗一般浓郁的乡土感情；有如画般美丽的家乡风貌，既反映了旧时代跋涉者的艰辛，又表现了新时代龙川人民精神焕发的英姿。读之令人深思，令人奋发。这是有助于我县中学生增进对家乡的了解，增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从而确立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而奋发读书之志。同时，这些作品体裁形式多样，语言朴实流畅，作家善于从自己的生活中选择题材，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写作时学习和借鉴的。

这是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与县教育局教研室合作编写德育材料的一次尝试。这一尝试得到了县政协领导和教育局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在编选过程中，

46.37

得到謝逢松、华棠同志在百忙中为本辑供稿和审定，謝逢松同志还为本辑题写书名。在此谨表謝忱！

编写乡情教育材料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缺乏实践经验，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我县各校师生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目 录

萧 殷作品选

- 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 (1)
月夜…………… (19)
萧殷碑文…………… (35)
萧殷简介…………… (35)

谢逢松作品选

- 关于《逢松诗选》的一封信……………李瑛 (36)
故乡行…………… (38)
六吟枫树坝…………… (42)
龙川花木三韵…………… (43)
长江颂…………… (44)
馨锤石…………… (46)
谢逢松简介…………… (47)

华 棠作品选

- 追本溯源探古城
——古邑龙川纪行之一…………… (48)
林荫蔽日话细坳
——古邑龙川纪行之二…………… (52)
园丁摇篮曲
——古邑龙川纪行之三…………… (56)
愿结霍山缘
——古邑龙川纪行之四…………… (60)
古老的龙川醒了
——古邑龙川纪行之五…………… (65)
我与文学…………… (68)

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

一 灰色的童年

我出生在广东龙川县佗城竹园里一个贫穷的家庭。佗城面临东江，背靠骛山，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处处古刹，古色古香，是南越王赵佗称帝的古城。但到我懂事的时候，它和全国农村一样，正面临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头上三把刀，地主官吏高利贷”。加上连年遭灾，农民纷纷逃荒要饭，美丽的故乡满目疮痍，一片凄凉。

我的家庭和其他农民兄弟的遭遇一样，生活相当困难。八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因风湿长期卧床，嫂嫂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哥哥不在家，在城里当店员，每月只拿五元工资。靠这微薄的收入，除了帮助家庭，还供我上学。

当时的政府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每年早晚两造，从惠州府派来的“粮官”仍然依期坐着轿子到乡下催粮，威风凛凛，前呼后拥。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要杀猪宰鸡敬奉。这种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黑暗社会，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仇恨的种子，我有一肚子不平、有一肚子愤怒，想向世界控诉。

一九二五年，“北伐军”第二次东征，以周恩来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的东征军，主力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其中的骨干。他们打败了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又点燃了东江人民革命之火。东征军张贴出“有田耕，有工做，有饭吃，有书读”的巨幅标语，使灾难深重的农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它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挨饥受冻的广大农民。

这时我正好十岁，读小学四年级。这动人的标语，对我这穷孩子也是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我第一次打开了眼界，开始憧憬着未来，梦想着一种人人有工做、有田耕，各尽所能的大同社会。

我的国文教师，是个很有革命朝气的人。既教语文，又教音乐。他上课的时候，经常离开课本讲天下大事，热情地向学生传播革命火种。我们小学的礼堂里也开始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世界三伟人”的像片。日益浓烈的革命气氛，冲击着萧条贫困的农村。我开始意识到：做一个人要象人那样生活，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可是，环顾四周破产的农村，满目疮痍，处处不平，是人间？又似地狱？我心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要控诉，控诉这不合理的社会。为了寄托我心头的不平之气和爱憎感情，于是我开始接触民间传说和民间歌谣。

我上了高小，很爱体育活动，也喜欢用功读书，连中午都不放过。我的成绩很好，高小四个学期成绩都是第一，除了用功，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身体好，记忆力强。每当老师讲课时，我的精神都非常集中，除了老师讲课，几乎什么声音我也听不见，因此老师所讲的，我全都听懂，全都记得。所以晚上自修，也不费气力。到考试的时候，成绩几乎都达到一百分。

由于成绩优良，课本已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学习要求。而我的求知欲又那样强烈，因此，除了背诵、默写英文生字外，我把大量时间，包括早晨、晚上的自修时候，都用来阅读课外书，特别接触了大量中、外文学读物，除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和《少年飘泊者》之外，连荷马的名著《奥特赛》也没有放过。（它当时的普及本叫做《俄德西冒险记》）

二 中学时代

由于几位小学教师积极帮助，替我缴了学费，我才能进入中学，此外，还靠教师向高班同学借来课本，才省去了买书的钱，可是每逢更换教科书（比如由“新学制”换成“新时代”）时，就如遇到了难关。

还是初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我记得当时曾写好了几篇散文，都在学校墙报上发表。有一篇叫《风雨之夜》，内容是反映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因为第二天要交学费，到处奔走借钱，但自己周围都是穷亲戚，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而那些富裕之家又不肯借，在这风雨之夜，分外凄凉，“我”失望、痛苦、悲愤、焦急，明天就要交学费了，该怎么办？

这篇文章，其实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是压抑在心头中的一簇愤怒之火，是对不公平的、人剥削人的旧社会的控诉和反抗。文章后来在广州一个全省展览会获得二等奖。这件事，对我这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的穷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同一时期，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挑水妇》。我读书的那间中学，几百个师生，只靠几个女工挑水。不管酷暑严冬，不管下雨刮风，那几个妇女都要到半里外的小河里去挑水，供几百人食用。这些默默无语的劳动者，在我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的《挑水妇》就是同情、歌颂这些劳动人民的作品。

初中时，我和高中一部分同学办了一个文学期刊《湖畔》。起这个名字，可能是受到英国“湖畔诗人”华兹渥夫的影响。

《湖畔》曾发表过好些进步的作品，也团结了一部分爱好文学的同学。我在《湖畔》第二期发表过一篇小说《明天》。写的也是自己交不起学费的不幸遭遇。

初中二年级时，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想在理工方面谋出路，需要经过大学的教育，因为家里穷，供不起学费，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对绘画，自己本来有很浓烈的兴趣，但考虑到绘画的工具，尤其是画油画，需要画布、画笔和颜料，也是无力购买的。想来想去，不得已，写点文学作品大概还有可能吧；不管纸张好不好，只要可以写字，总可以买得起，总可以写东西。这样一想，自己便悄悄下了决心。为了实现这一志愿，我拼命下苦功读书。同学们都起得很早，利用早晨在校园里读英语。我为了能精读小说，比他们还要早起一个钟头。独自一个人在琢磨人家的作品，对出色的章节，不惜时间反复推敲。那时，我就揣摩出人物和情节的关系，也猜度到文学作品动人的力量在哪里。除了小说，我写过许多新诗，有的还在上海泰东书店出版的《学生文艺丛刊》发表过。其中一本手抄诗集，还在毕业展览会上展出。此外，我也画过一些中国画，记得大多数是意笔画，裱制后也在毕业展览会展出。

由于家庭贫穷，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希望，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出路——准备去当店员，决心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但我没有想到，在几个同学的鼓动和帮助下，我忽然离开佗城，离开家乡，落上一只木船，在苍茫的暮霭中，扯起人生的风帆驶向省城——南中国的大都会广州。

三 我进了美术专校

广州，车水马龙，红灯绿酒，繁华热闹，它依然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是，革命的风暴狂飙席卷，使这个城市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多次受到革命的洗礼，已成为革命的中心，成为多少革命青年正朝夕向往的英雄城。

刚从农村出来的穷青年，彷徨在这座繁华的都会，眼前是一片缭乱和迷惘。我住在惠爱东路小里弄里一个旧祠堂的破陋房子里，地面是湿漉漉的烂泥地，用木板间隔成一小间一小间，我就在这地方安身，住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在日报上看到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招生广告。这诱人的广告，使我反复考虑，去不去报考？我想学画，可是家庭确实太穷了。连一块钱报名费都拿不出来，即使考取了，谁来负担我的费用呢？好些同来的同学，都鼓励我：“去吧，郑文生（我的原名），去试一试也好，反正我们已来到广州，总不能老呆在这里，总得找一条出路呵。”有几位家境较好，经济比较宽裕的同学，给我凑了一块钱报名费。于是我决心去应试一番。

我的入学考试成绩不错，作文、英语的成绩都很好，绘画考试是“自由题”，当时只带了一块赭石，连绿的颜色都没有，这条件决定我只能画一幅丹枫之类的东西，由于一时感兴，遂竟画成一幅从枫树刚要起飞的喜鹊。

一棵大枫树上，抹着一层金色的阳光，一只喜鹊刚刚张开翅膀，正欲离开枝干，从树上俯冲下去……

考试结果，我作为第四名被录取。我在市美，是靠哥哥“凑会”来的钱供给的，这是客家地区一种流行的“经济互助”。每份五元、十元不等，这种办法，可以集中一点钱解决某一个人的紧急困难，比高利贷剥削要合理得多。

我靠哥哥的支持，勉强强读了一年。这一年，我在老师指导下成天描摹“古美人”。不但不能学习西洋画，连高奇峰、高剑父的作品也不能借鉴。学校一部分教师把这些有点创新的画派斥为“折衷派”。认为他们的作品全是不中不西的。

不但不能在课室内公开向他们学习，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模仿他们。其实，高剑父等人的作品是吸收了西洋画某些精华的。这种固执、保守的作风使我反感、失望，由于这种心境，我不但想学西洋画，甚至让我转到图案系也愿意。但始终未能取得学校的同意。整天坐在课室里呆板地描摹几千年前的古美人，离现实生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目前的现实却不能让人宁静，整个社会面对着农村破产的悲惨情景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炽热的心。我觉得，我应该从“古美人”的圈子里冲出来，勇敢地去反映现实，去诉说我内心的不平，急不可耐希望采用别的武器去参加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和现实斗争。于是我饥不择食地拿起笔来写小说。《乌龟》、《疯子》等，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出来的小说。

四 我的处女作《乌龟》

《乌龟》的基本情节和主题思想：

……我和一群孩子，在码头附近玩耍，忽然迎来了一个身材高大、面色沉郁的码头工人，小孩头看见了，他便领着大家，举着棍棒，一拥而上，连声叫嚷：“乌龟！乌龟！”

一天，我刚爬起来站在床沿上，妈妈正替我穿衣服，我向窗外一望，忽然大声叫嚷：“乌龟！乌龟！”妈妈吓了一跳，惊奇地问我：“你怎么这样无礼？”我指着窗外低头走路的一位工人，告诉妈妈：“看，他就是乌龟。”妈妈难过地对我说：“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是陆伯伯！”她叹了一口气，同情地添了一句：“可怜的陆伯伯呵！”

有一次，我在门外玩蚂蚁。弄了一只苍蝇让蚂蚁抬来拖

去，等快拖到洞口时，又把苍蝇拿得远远的，让蚂蚁再一次拖向洞口，真好玩呵……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只手摸着我的头顶，还喊了一声：“孩子！”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乌龟”。

“孩子，你想听乌龟的故事吗？”

我这时正玩得来劲，回头一看，苍蝇已被蚂蚁拖进洞里了。我急得直躲脚，又哭又闹，向“乌龟”抬脚就踢……

有一次我问妈妈：“那个乌龟怎么会是我的救命恩人？”妈妈说了下面一件事：有一天，我和孩子们在码头附近游泳。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忽然从一处浅滩滑向一处深潭，喝了大量的河水，便迷晕了……妈妈说，“要不是陆伯伯当时潜入深水中把你救起来，你早没命了！”从此，不仅常听妈妈感激陆伯伯的话，我自己对这个“乌龟”也不那么讨厌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没见到陆伯伯。妈妈对我说：“怎么好久没见陆伯伯呢？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妈妈煮了点好吃的，叫我去陆伯伯家里看看。

我来到陆伯伯的家，看到他病倒在床上，脸上十分憔悴。只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非常破漏的房子里，境况十分凄凉。

我一连几次上陆伯伯家，慢慢对他改变了看法。我觉得“乌龟”为人正直、勤恳、善良。但他总好象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似的。

有一天，他终于向我诉说了他不幸的遭遇，我听得似懂非懂。

陆伯伯忧国忧民，对旧社会一腔怒火，强烈的愤怒和对革命的追求，使他毅然离开了年青的妻子，参加了东征军。

在他和勇士们讨伐军阀的时候，他的在富商家里当保姆的

妻子给财主强奸了。她受到凌辱，满腔悲愤，牙一咬，跑到林子里自杀了。

东征胜利后，陆伯伯回到广州，他向法院控告迫死他妻子的东家。但是，控告结果不但坏蛋没有得到惩办，自己反而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班房，判了两年徒刑。

刑满后，陆伯伯由于生活所迫，只好在码头上当苦力，他被人看作“乌龟”，受尽了人间的凌辱……陆伯伯的病越来越重，最后，终于含恨死去，埋在郊区的乱葬岗上。不久，妈妈带我来到郊区的乱葬岗。正是黄昏，夕阳西下，秋风萧索，陆伯伯的坟墓周围，乱草萋萋，秋风在啾啾哀鸣，我仿佛觉得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悲伤的色调，只有妈妈在吞声地哭泣。最后，妈妈领着我向陆伯伯深深鞠了一躬……

《乌龟》的情节大致就是如此。作品在《广州民国日报·东西南北》发表后，还被人改成话剧上演过。

《乌龟》是我一九三二年写的几篇小说中的一篇，也是我前期的代表作之一，它是我的创作道路的起点。

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初，在发表《乌龟》不久，我又在《东西南北》发表另一篇小说《疯子》，主题是控诉黑暗的旧社会，对一个农民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的道路，原因就是我很早就对新的社会制度有朦胧的理想，因之对剥削阶级的所作所为，怀着强烈的憎恨。同时，我对周围的农村生活十分熟悉，不仅熟悉邻居们的愿望和思想，连他们的痛苦和悲哀也了如指掌。特别是九一八事件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进，不仅农村破产更加恶化，亡国的威胁也日益加深。于是，心中有许多激情要迸发，有许多积愤要呐喊，有些不平的事要宣泄，描摹古美人既

使我厌倦，我便急不可耐地拿起笔杆来倾诉心中满腔悲愤，正是这种种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

五 在故乡佗城

我在市美学习一年，只是描摹古美人和花鸟虫鱼，远离现实生活，内心日益焦躁不安；再加上家庭困难，经济拮据，这种种使我无法在市美继续留下去。不得已，于一九三二年夏，我回到故乡，并侥幸地在龙川乡村师范找了一份工作——教绘画。那年暑假，本来曾约好市美同学梁荣芬同赴杭州，打算转学杭州艺专。可是，这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家庭这么穷，哪有条件把空想变成现实？摆在面前迫切的问题，是找工作，谋饭碗。

乡村师范的校长程本海是安徽人。他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他对教育事业很有理想，且与人民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结合起来。他自己担课，还带领学生从事农业劳动。他固然很有学识，而他的品德和为人，更引起当地人民的敬重和称赞。可惜第二年春，乡村师范就关门停办了。一九三四年春，我便转到佗城小学教书。

这一期间，我写了一些散文诗。比较有印象的是《第一次颤栗》、《牵牛花》。

《牵牛花》以象征的手法，以物喻人。我在作品中歌颂生命虽短促、却迎着晨光开放的牵牛花。

《第一次颤栗》也是一篇散文诗。两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正在森林里跳舞，忽然一个恶魔从丛林中冲出来，把她们痛打一顿，打得她们莫名奇妙。借此讽喻当时好人受欺凌，坏人当道的黑暗社会。

在佗城小学或民众教育馆工作期间，每年暑假，我都到广

州找职业，有个同学曾介绍我到一家报馆当校对，但因无裙带关系，愿望还是落空。到秋天落叶满地时，我只能怀着失望的心情怅然回到家乡。

一九三六年春，我在龙川县民众教育馆工作期间，国民党军队有一个团驻在佗城。该团政治部有个“同志”，经常来借书，和我搞得很熟。后来，不仅从谈话中知道他是个革命者，而且，他还不时带来一些宣传革命统一战线的书刊。我从中选了些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文章，赶刻蜡板，趁黑夜，与工友徐阿香悄悄油印了数十份，然后由阿香带到佗城几个地方去张贴并散发。

这时期，我开始把眼光注视整个革命形势的变化。并和一些活动的知识分子接触。除了和吕蒙、赖少其等同学通信外，我和吴有恒也开始建立通信联系。

六 在故乡的创作活动

在佗城工作时期，我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除上面提到的散文诗《牵牛花》《第一次颤栗》和小说《乌龟》《疯子》外，尚有小说《借贷》《车伕阿伙》《哥哥的脸》《沉落》《倒闭》《灾》和报告文学《年关杂写》等等。

如果《车伕阿伙》《哥哥的脸》还局限于反压迫，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那么，《倒闭》《沉落》《借贷》《乌龟》《疯子》《灾》等作品，接触的却是比较重大的社会主题。这期间，我写的小说大都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东西南北》上。有些诗则在《岭东民国日报》刊出。

我和《东西南北》的编辑从未见面，也未通过信，可我寄给《东西南北》的作品，从没有退稿，全都发表了。我所以走

上文学道路并继续努力，与一个对文学作品有鉴别力的编辑是分不开的，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七 炽热的革命年华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离开佗城来到广州。

从一九三四年开始，为了找寻出路，我每年暑假都跑到广州。一方面因未上过大学，社会上又瞧不起低级职员，总不安心在这小城里工作；其次，有一小撮反动家伙背后说我是共产党，随时想陷害我，一有机会就造谣攻击，为此，我很想离开这个环境到另外一些地方去。可是两年暑假都找不到工作，以致耽误到九月过后才回到佗城，因而下半年便再找不到工作。可以说，出路一直未找到。我每年下半年都失业。这一次离佗城，我暗暗下了决心，不管遭遇怎样，我决不轻易回佗城了。我向中山大学地质系学生莫柱荪打听，结果，我决定住到中大宿舍。自七月到十二月，我在那里度过了最难忘的岁月。在那里，我参加过许多革命文学活动，写过许多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杂文，参加了党所组织的革命活动，不仅印象深刻，而且还促进我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四十多人在财厅前上海杂志公司楼上开了一个会。当时一个从日本回来的陈达人，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在会上反复强调国民党那套思想统一，根本不提一致对外。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虽然勉强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但大家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因为我们（我只记得有李桦、楼栖、赖少其等）都得到第二天到白云山去参加一个会议的通知。

第二天，我们在白云山半山一个凉亭里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一百多人。我只记得杜埃、叶红、（有一位姓袁的），别的人都忘记了。大概是广东文学界的一次联合会。会议提出的口号非常鲜明，就是号召大家一致对外，团结抗日。会上，成立了广东艺术界联合会，下设小说、诗歌、歌咏、戏剧等组。此后，各个小组开展活动，我主要参加小说组，有时也参加诗歌组。记得还有一个歌咏团。这些组织，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当时，各种文艺思想，各种风格流派都非常活跃，但也非常复杂。各活动小组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论。例如，诗歌组就经常和一个写怪诗的柳木下（原名刘暮霞）发生争论，气氛相当活跃。参加这个组的成员很多，现在留在记忆里的，只有温流，黄宁婴，陈芦荻，李六石等。同时在社会上的斗争也相当尖锐复杂，各种思想，各派别的政治力量，都在互相拼搏，都在争取青年。有一天早晨，在中大食堂一张饭桌上，就发现了两种传单——共产党的和国民党蓝衣社的，针锋相对，斗争异常激烈。这在我们当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应。青年的大多数，都赞扬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痛斥国民党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谬论。这意味着斗争越来越激烈，越往前走，困难就越多，风险就越大了。

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郑彦棻是国民党的一个党棍，国民党右派的一个头目。此人阴险狡猾，他看许多学生越来越左倾，拥护共产党的青年越来越多，便想出各种花招拉拢学生。他们向学生许愿：法学院图书馆藏书很多，可以向学生开放。欢迎大家借阅，并答应购进一批新书。我们知道这是郑彦棻耍的鬼

把戏，便将计就计，开了一大批“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新书目录。在这场斗争中，郑彦棻梦想拉拢青年并没有成功，相反，青年人倒看到了不少不易买到的进步书刊。

一九三六年夏，陈济棠已退走，蒋介石的势力已到达广东。蒋介石的行营已迁到广州黄埔。有一天，那个行营主任刘健群来中大讲演。他竟公然叫嚷：“你们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们，我警告你们……”对共产党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咬牙切齿，简直到了刻骨的仇恨。

刘健群这一招，不但没有把我们吓倒，相反，倒激发我们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斗争。许多学生对他的反动气焰忍受不住，纷纷退场。讲演开始时，有二千多听众；到末尾时，只剩下不足两百人。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刘健群还在礼堂上谩骂时，我们就组织壁报，共几十个人分别反击，各自编写成十几个壁报，挂在礼堂两边墙壁。同刘健群的胡言乱语针锋相对，大杀他威风。第三天，香港《珠江日报》还发表了我们驳斥刘健群谬论的杂文。这对当时的反蒋斗争，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我们在建于山头的中大法学院礼堂里，开过一次震撼人心的会议。

记得是一个秋日黄昏，我们按时来到法学院草坪上。可是，都不让进去。据说，礼堂的电灯出了故障，正在修理。于是，我们就在门口草坪上，三三两两地闲聊或散步。当时我们蹲在草坪上闲谈，距我们不远的坪上，有一对男女青年也象我们一样等候开会，但他俩似谈得很亲密。与我们蹲在一起的刘仑说：“如果要用象征派的手法来抒写这情景，可以说，罗曼